



论张爱玲《秧歌》与 《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书写

邱锦蕾

IVY GRACE KIU KIING LUI

拉曼大學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2

论张爱玲《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书写

邱锦蕾

拉曼大学中文系

二〇一二年四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张爱玲《秧歌》与 《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书写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邱锦蕾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辛金顺 助理教授

呈交日期：06-04-2012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2-3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3-4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4-7
第二章	初步了解《秧歌》与《赤地之恋》	8
第一节	《秧歌》背景	8-9
第二节	《秧歌》解析	10-12
第三节	《赤地之恋》背景	12-14
第四节	《赤地之恋》解析	14-18
第三章	《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	19
第一节	文中对共产党的描写	19-23
第二节	共产党员的相处方式	23-25
第三节	农民对共产党的看待	25-26

第四章	《秧歌》与《赤地之恋》的比较·····	27
第一节	饥饿形成背叛·····	27-29
第二节	土改时期的农村问题·····	29-32
第五章	结论·····	33-34
参考文献	·····	35-36

论张爱玲《秧歌》与《赤地之恋》
的反共意识书写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
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
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 AAB 03724

日期：06-04-2012

摘要

《秧歌》与《赤地之恋》是张爱玲在香港时期所写下的“反共小说”。

“反共”造就了张爱玲小说中新的一个方向，让读者证实了张爱玲不仅仅可以在“爱情”题材方面写下一手好的作品，在“社会、政治、反共”方面一样可以写出令人对她刮目相看的小小说。

在《秧歌》与《赤地之恋》两部小说中，张爱玲有其特别的写作方式，她在创作时可以拿捏好故事情节，在“虚构”与“真实”两方面都控制得相当好。小说中的人物、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在张爱玲的笔下都是那么地“真实”，虽然小说的内容多为“虚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张爱玲在整篇小说的写作手法。

本论文企图通过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的两部小说做研究，探讨她在这两部小说的反共意识。笔者将以“细读”以及“诠释法”来对小说进行解读，深入了解张爱玲写反共小说背后的目的。笔者将着重点放在“土改”时期农村在“共产党”带领之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由此去探究小说中的“反共意识”来。

关键词：张爱玲、反共小说、土改、共产党、反共意识

致谢

毕业论文在此宣告收尾，意味着我在大学生涯的三年也将近尾声了。回想起来，刚踏进大学的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老实说离现在是多么地遥远啊！在这个校园生活了三年，我自认感到非常荣幸可以拥有一班“疯疯癫癫”的好友，循循善诱的老师们一起度过，我感到万分感激。

说实在的，要完成一份长达两万个字的论文确实很不容易，且富挑战性，但在所有人的支持之下，我才有动力勉强地完成了在大学中最艰难的论文。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辛金顺老师。不论是从论文的选题、架构的设计、结构的布局到最终的论文定稿，还是从内容到格式，从标题到标点，他都费尽心血。为了我们的论文，辛老师甘愿放弃他的休息时间，他这种无私，为论文学生奉献的敬业精神，真令我佩服，所以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示我对他的万分谢意。相信没有辛金顺老师的耐心栽培、孜孜教诲，就不会有我论文顺利完成的一天。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同学兼死党们，没有大家的互相鼓励，相信大家缺少那一份动力来做论文吧？在做论文感到疲倦的当儿，非常感谢死党们愿意“忙里偷闲”陪我闲聊一会儿，好让自己暂时可以放松一下，把压力纾解纾解。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觉得生活添加了色彩，我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

最后，我也不忘感谢我的家人以及一路走来都给予我鼓励及支持的亲戚们，尤其是我的姨姨，想说：有你们真好！因为有你们的鼓励，我才有追求进步的勇气和信心。因为有了你们，我才有今天！在此，我想把我的幸福快乐都送给关心及支持我的每一个人，祝他们一切都顺利。

第一章 绪论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在什么年代出版，其成就都一直达至最高的顶峰。1952年，张爱玲经香港友人推荐之下，前往美国新闻处供职，因此写下了两部长篇反共小说，即是《秧歌》与《赤地之恋》。¹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中描述了中国政治的不满，甚至对中国共产党写下了万分的反感，因此借着这两部小说对共产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张爱玲的小说，相信熟悉她的读者都会了解，其写作风格基本上都是一些对女性的书写、美丽凄艳的写意以及爱情的描写，可是之后却在突然间“冒出”了“反共小说”，这必定有张爱玲的道理。但她并没有因为写作风格的改变而导致她的文笔在瞬间变得“不完美”，这就是张爱玲在写作的特别之处。当然从《秧歌》及《赤地之恋》中，还是可以看到张爱玲最擅长的“爱情”抒写，她隐约地将它们穿插到故事中，这显得故事较有新鲜感。

针对此论文，笔者所要探讨的是张爱玲《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中的“反共意识”，从阅读此小说可以看见张爱玲在另一方面的写作风采，这意味着张爱玲不仅只能抒写“爱情”题材，同时，她在处理土改时期的“政治”以及“共产党”，无疑也有其成功的一面。

¹于青著：《奇才玉女——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页122。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如果说张爱玲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带有一个谜，相信不少读者也许会赞同吧？被称之“奇才逸女”的张爱玲确实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 40 年代的她更是红遍了整个上海，成为了当时有名作家。一直到五六十年代开始，张爱玲的作品也陆续风靡港、台以及一些海外国家，也因此，导致许多读者在细心研读张爱玲的小说之下，还影响了台湾及海外一些有成就的当代作家的创作。

张爱玲在 40 年代的作品中，几乎都是写女性形象，而“女性”是她在作品中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中的一系列典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悲剧式人物。张爱玲大量展示具有私人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生存状态，所以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可以看到张爱玲独特的一面，即是她几乎都以上海、香港等大都市来作为背景。

但令笔者难以置信的一点是，从未对政治做一点干涉的张爱玲竟然在 1954 年完成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反共小说”。她在 1947 年甚至还诚挚又鲜明的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²但令人好奇的是，从上海逃到香港，当时正处于“险境”的张爱玲并没有坚持自己，而写下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张爱玲突然改变了自己擅长的写作风格，而写起了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

²胡辛自选集：《张爱玲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年，页 311。

“反共小说”，这疑点确实刺激到了笔者，使笔者对这两部“反共小说”产生了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相信了解张爱玲的读者们都知道，她的《秧歌》及《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美国新闻处甚至将其小说作为“反共宣传品”。³看到张爱玲突然改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从原本自己熟悉的“爱情”题材转为自己一无所知的农村与政治的题材，想必熟悉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们一定会感到奇怪，毕竟这两部小说与之前张爱玲所写的小说题材完全扯不上关系。因此，这两部小说自然地引来了刺激性，笔者决定对《秧歌》及《赤地之恋》这两部“反共小说”进行深入研究，以张爱玲“香港时期”的背景进一步做研究的轨道，以至笔者可以从中探究出《秧歌》与《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的特色。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对于张爱玲的小说，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其小说，但至于张爱玲的两部“反共小说”而言，研究其“反共意识”的学者并不多，这也是笔者想在本文想探讨的原因。经过了解，笔者认为想要对张爱玲在香港时期所写的小说进行解答的话，想必一定要对她的创作背景以及作品有深厚的了解。针对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笔者所要研究的范围即是小说中的反共意识。笔者将利用一些有关《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参考书来加以分析

³费勇著：《张爱玲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39。

讨论，例如先了解张爱玲写这两部小说的背景，然后藉由所得的资料中，再进一步对小说做深入的思考，再从中探究出张爱玲写此小说的目的。

针对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的两部小说，由于是张爱玲在香港时期的作品，所以笔者主要将从张爱玲“香港时期”的两个阶段及她的个人背景来与这两本小说进行探讨。此外，笔者将采用“诠释”以及“细读”的方式来对本论文做出研究，首先，笔者先从两部小说的背景出发，要了解一部小说并不容易，尤其是作者背后所要带出的意识，再来，笔者将从小说中进入解析后再探讨小说中的“反共意识”，最后再从两部小说中做出对于“饥饿形成的背叛”以及“土改后农村饥荒问题”的比较，这就是笔者在整份报告中所要研究的范围及方法。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张爱玲的《秧歌》及《赤地之恋》这两部反共小说基本上已经有不少学者做研究了，虽然研究范围都不一样，但在内容中都可以看到对张爱玲写这两部反共小说产生了种种疑问。当然，笔者也不例外，对张爱玲突然改变写作风格而感到无比兴趣，因此才会决定要从《秧歌》和《赤地之恋》中探讨出其反共意识。此外，在笔者阅读的好几篇前人文献中，看到的是学者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给予的评价为多数。而笔者将以〈也谈《秧歌》与《赤地之恋》〉、〈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及〈张爱玲的艺术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三篇期刊论文来作为参考。

张艳艳的〈也谈《秧歌》与《赤地之恋》〉中只开了两章，也就是“关于题材问题的再辨析”以及“对于作品价值评价的再辨析”。⁴前者，张艳艳说到了一向对于自己的创作素材不做任何说明的张爱玲，却分别都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提到了题材问题，还认真地辩白题材的真实性。但对于这一切，张艳艳本身认为张爱玲不需要对自己书写的题材做额外的声明。“对于作品价值评断的再辨析”这个部分说明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争议性很大，张爱玲原本是一位不涉及政治文坛的优秀作家，但却留下了这两部政治立场鲜明的小说，让许多学者都产生了莫名的疑问。无可否认，张爱玲的这两部反共小说的确有不少学者给予不好的评价，认为它们是有失一贯的文学水准。就连张艳艳也是如此认为，她觉得整部小说写得不太理想，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本。但笔者却认为张爱玲之所以会在这两部小说中提到写作题材问题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第一次的写作并没有很大的信心，毕竟是擅长于“爱情”的题材，突然改写对“政治”的题材，而且对“政治”方面张爱玲既有不熟悉，所以说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尔纲〈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中，谈的都是对这两部小说的看法。⁵在尔纲的整篇文中，他较多谈到了柯灵和夏志清对此两部小说做出的评论，谈的几乎都是作品的好与不好。张爱玲在上海生活的每个时期，柯灵都有在，所以对于张爱玲的事情可说是相当清楚，他对张爱玲的这两部反共小说感到很失望，也很坦率地认为“这两部小说是坏作品，我很为张爱玲惋

⁴参考张艳艳：《也谈〈秧歌〉和〈赤地之恋〉》，广东：汕头大学文学院，2008年，第86期。

⁵参考尔纲：《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山东：山东社会科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十六卷，第一期。

惜。她写了这样两篇虚假的作品，意味着与祖国决裂了。”⁶柯灵认为两部小说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所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连文字都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采。至于有些资料提到张爱玲曾到过农村生活，柯灵在此澄清张爱玲从未到农村生活，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农村生活，更不可能可以写出好文章。但是，夏志清给予张爱玲的评价则是与柯灵相反，他把张爱玲捧得非常高，他对张爱玲的《秧歌》及《赤地之恋》这两部反共小说感到骄傲，认为张爱玲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甚至认为那些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都不能和张爱玲相比。所以说，笔者认为一部作品写得好或不好是依照个人看法而做出评价，并不是一味麻木跟从别人的眼观及想法对该作品做出评价，而是要了解熟悉该部作品，再深入探讨研究才能下判断。

袁良骏〈张爱玲的艺术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所谈的都是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败笔，从两个大题来讨论，一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说起”，二是“不是张爱玲自己的文章”。⁷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存在很多争议性，尤其是《秧歌》和《赤地之恋》，很多学者都写下了最宝贵的评价。袁良骏认为《赤地之恋》是一部违背创作规律、违背艺术良心的失败之作。有深入了解张爱玲作品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是她在受雇的美国驻港新闻处的“反共反华”宣传品，而当时写“反共小说”的作家有很多，而张爱玲只是其中一个。袁良骏对张爱玲的这两部反共小说有很多不好的评语，他觉得张爱玲在写反共小说的文笔一点光彩都没有，他甚至认为这两部小说只能

⁶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江迅〈柯灵追忆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页202。

⁷参考袁良骏：《张爱玲的艺术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文学会），2008年，第87期。

在反共实用主义上下工夫，根本不可能写出什么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但是，综合袁良骏对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研究，虽然笔者觉得她的这两部小说的确是有一点违背艺术良心的作品，但是这毕竟有牵涉到她个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第二章 初步了解《秧歌》和《赤地之恋》

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相信有少数的读者对此小说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所以笔者将以大概的叙述方式让这两部小说可以使读者对它有更进一步的概念。笔者在这章节便以“背景”以及“解析”的方式来加深对这两部小说的认识。

第一节 《秧歌》背景

《秧歌》1954年在香港出版后，台港、海外的读者往往视之为“反共小说”，美国新闻处甚至将它作为“反共宣传品”，在东南亚散发。⁸在这部小说中，张爱玲的立场始终还是作家的立场，她把时代变迁之下的普通人命运或可以说是革命与人的复杂关系编成了一部小说。《秧歌》这一部小说是张爱玲首次突破了自己写作的视野，竟然选择了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她把目光转向了更广泛的土地与农民，是为了要去领悟那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下沉默的声音。

张爱玲在“跋”中清楚的述说了《秧歌》这部小说“故事的来源”。小说中以人、事、时、地、物来对整部小说进行了描述，故事情节段落非常整齐，让读者可以轻易明白故事中所要表达的情节。《秧歌》中的主要人物有金根、月香、谭大娘、王霖、顾冈、沙明以及金花。“跋”中一开始提到《人民文学》上，有一个共区青年作家在华北地区碰上春荒，农民为饥饿所迫去抢粮仓，而当地负责干部率领民兵开枪弹压。过后张爱玲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到南昌

⁸费勇著：《张爱玲传奇》，页 239。

附近的乡下工作，每天都吃米汤夹着一寸来长的一段段青草。1951年初，凡是参加华东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每人都要随身携带几十万元人民币，好让自己可以在城镇上购买私房食物。此外，还有报上连载的一个女干部在老共区生活的自传。根据这些所说的人物，从小说中都可以看到。

此外，张爱玲在“跋”中提及有关“事”的来源，首先是因为农民为饥饿所迫而抢劫政府粮仓，干部开枪镇压，还颓丧地说“我们失败了！”。从1950年冬起，张爱玲又不断地从苏北与上海近郊来人口中听到“乡下简直没有东西吃了！”，农民相互告贷。接着还有一个中共的影片《遥远的乡村》，剧中放火烧仓的那一幕让张爱玲记得非常清楚，因此在小说中自然也穿插了进去。最后关于女干部自传中被美化了的共区生活回忆都出现在《秧歌》这部小说中。所以，《秧歌》中的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事情的发生终究还是有根据的。

至于《秧歌》故事中的时间，“跋”中已经写到，“1951年初，参加华东土改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从1950年冬天起，又不断的从苏北与上海近郊来人口中听到【乡下简直没有东西吃了！】”的两句对照中，我们可以知道《秧歌》的整篇故事都在冬天时候发生的。至于小说中的“地”则是上海，而“物”就如“跋”中所承载的一些“刊物”以及物质上则有如食物、金钱、粮仓等，这些在小说中几乎都贯穿全场。

结合了以上所写，《秧歌》表现了土改时期的暴力与残酷情形以及农民对当时社会及土改时期的共产党“过分”举动而集体反抗。

第二节 《秧歌》解析

《秧歌》写的是土改后的农村，整篇故事都出现了“饿”的画面，让笔者觉得非常可怜。在上海做帮佣的月香“回乡生产”，虽然发现家里在土改后有分得了天地，而且丈夫金根也当上了劳模，但是家乡的人还是一样受苦，一日三餐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不能维持温饱。他们的女儿阿招老是闹着肚子饿，亲朋好友都陆陆续续来向月香借钱，导致亲友的关系渐渐变得疏远。最令金根恼怒的是月香不肯借钱给刚嫁出去的妹妹金花，金根非常疼爱金花，之前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一直到金花嫁出去后，金根还是不愿看到她在婆家受气为难。但是，金根也毫无办法，因为钱毕竟是月香辛苦赚回来的，他只好默默不出声。可是，他要月香做一顿干饭给金花吃，好让她可以吃得饱，但是月香煮出来的还是平日吃的照得见人影的米汤，金根看了非常生气，心里的闷气和对妹妹的内疚更加深了。

《秧歌》这一部小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看出了这纯粹作者只是在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且故事都一直围绕在“饿”中，三餐只是喝米汤的日子简直让笔者觉得非常煎熬。尽管饥饿与恐惧绑住了所有人的内心，但大家见面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偶尔的“讽刺”，尤其是谭大娘最喜欢讽刺金根和月香，认为金根是劳模，所以生活要好一点，但是金根的生活也是跟普通人民一样，不仅要挨饿，还要比一般人更刻苦耐劳，但却没有一个好的日子过。这或许就是《秧歌》中真实的线索，虽说饥饿已笼罩着整个乡村，但似乎大家有化解的“精神胜利法”。新年期间，虽然每村每户每个人都受着饥饿的煎熬，但他们还是聚集在村公所外面演习扭秧歌，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风里飘来

咚咚的锣鼓声，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⁹小说的主轴意象“秧歌”，原本是欢愉的景象，但是却出现在这悲凉的场景上，而且可以很明显看到两排扭秧歌的队是非常参差不齐，这时，张爱玲所要表达的或许就是她的“荒凉”和“无奈”。

在《秧歌》这部小说中，笔者看到了以上的“真实”，但小说也有一条“虚假”的线索。这条“虚”的线索并不那么完整，事实上到第六章才穿插进来。¹⁰故事中写到有从上海来的一位小资产阶级的作家顾冈下乡体验生活，想要写成一个不同凡响的剧本。他是一位以旁观者的身份被派到这哀鸿遍野的饥饿里寻觅所谓的“乡村神话”，以便可以到更大的空间去宣示、布道乡下的优越性。所以，小说中又多了一些穿插，也多了另一种重视角来观察饥饿世界里的“人造神话”。事实上，顾冈编剧本的过程被安排成他所要编写的歌颂大时代的作品与农村实际情形处处不符，令他感到一连串的尴尬，因此他勇敢地背过脸去，想象出一个水霸的故事，虽然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水霸”。张爱玲刻意要让顾冈在饥饿现实面前，还编造假故事、假剧本，莫非就是要借此讽刺当时文人在创作时的“神话性”来源。

另外，顾冈与王霖俩之间的关系上，很明显双方都对彼此没有产生很大的好感。王霖对“‘解放后’才加入他们阵营的投机分子”的顾冈感到愤愤不平甚至还鄙视接待他，但过后又觉得可以借他们“体验”出的“神话”来换取政绩，以使自己早日离开这又穷又偏僻的乡村。而顾冈也觉得王霖如此资深的资历却在乡下当一个村干，肯定是一个危险分子，所以轻视他，认为接近他会对

⁹张爱玲典藏 5：《秧歌》，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页 201-202。

¹⁰余斌著：《张爱玲传》，台北：晨星出版，1997 年，页 304。

自己不利，因此也疏远他。其实，张爱玲在故事中会有这样的穿插小故事，莫非就是要让两个来自不同基层的小人物都从政治角度来考验、鄙视、猜疑对方，将时代特征烙在他们冷漠而麻木以及丑陋的内心上。

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秧歌》的扉页上就影印着胡适之先生的亲笔题赞：此书“写的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我读的中国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此外，夏志清也在小说史中称道“《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另外，龙应台女士更将《秧歌》为“世界级的作品。”¹¹因此从这里看来，张爱玲的《秧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虽然，在中国学术界以前，因为《秧歌》是一部“反共小说”的关系，所以就避而不谈，但20世纪之后似乎在小说中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给予张爱玲的好评越来越高。

第三节 《赤地之恋》背景

《秧歌》出版后，张爱玲在同年又在香港出版的《赤地之恋》并有着不同的命运。张爱玲表示《赤地之恋》这部小说是在“授权”的情况下写出，故事大纲全部都被限定好，根本就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因此张爱玲对此小说感到“非常不满意”。¹²

《赤地之恋》这部小说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初期的中共历史事件，也就是一个建国之初政党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小说中贯穿了“土改”、“三反”及

¹¹参考《张爱玲传奇》，页239-246。

¹²杨泽：《阅读张爱玲》，台北：麦田出版，1999年，页144。

“抗美援朝”，成为故事的前景。农村并不是《赤地之恋》的唯一背景，甚至不是主要的背景。¹³此小说所描写的领域包容了更广大的时空，从乡村到城市，从“土改”到“三反”再到“抗美援朝”，而农村的土改只是主人公刘荃坎坷命运中的一站。

张爱玲在《赤地之恋》的自序中写到这样的一段：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并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就完全没有触及。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同时我的目的也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这里没有概括性的报导。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¹⁴

与《秧歌》不同的是，《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张爱玲特别辩护强调“这是事实”。故事中，她把许多小故事都叠合在一起，形成了各式各样有趣的“真事”，张爱玲或许是亲耳听来也或许是亲眼看来的，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的手法，才能更准确地凸显出此小说的背景。《赤地之恋》的整篇故事背景前半段写的是知识分子下乡北方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而后半段则写的是在都市，上海的“三反”及“抗美援朝”运动。主要场景有在北方、也有在上海，最后的朝鲜战场也并没有明显的地标性，但这些都非主要。

¹³胡辛自选集：《张爱玲传》，页 311。

¹⁴张爱玲典藏 6：《赤地之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页 3。

张爱玲在 1952 离开上海到香港前，一直都住在城市，上海以及香港。这两个城市都具有殖民身世与风华。如果要张爱玲写都市盛衰，尤其是上海，她可说是相当拿手，毕竟张爱玲在上海的时间最多，而且她也承认自己非常喜欢都市的生活。如果要张爱玲对农村进行描写，恐怕还是会让读者们有质疑的空间。但无可否认，张爱玲曾经也有到温州农村小住过，也跟随参加了土改工作¹⁵，而回来不久后就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所以，经过那么仅仅一次的土改工作经验，多多少少也让她在书写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实事”讲求的就是要有依据，不然将失去它的真实感。

《赤地之恋》真实反映了在土改时期一个政党对人民的暴力行为，政党以外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处，他们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以及思想，凡事都得听从政党的命令。

第四节 《赤地之恋》解析

《赤地之恋》这部小说的结构明显可以看到一分为二，前半段写的是农村，后半段写都市——上海。故事中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大陆农村“土改”的残暴、“三反”的混乱以及“抗美援朝”中的惨重伤亡这三大运动来作为事件的动机。¹⁶在张爱玲笔下的《赤地之恋》看到的是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干部似乎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此外，“土改中的暴力行为”是张爱玲在这部作品着力表现的一个主题。

¹⁵冯祖贻：《百年家族——张爱玲》，立绪出版社，1999年，页391。

¹⁶高全芝著：《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页145。

《赤地之恋》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政党对人性的摧残与控制，在他们面前绝没有存身之处，更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与思想，这让刘荃感到自己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社会中。工作组的张励品德恶劣、好大喜功，他因为要追黄绢不果，马上想报复，还将村子的斗争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刘荃的理想主义撞上了冷酷的现实，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左祸”。¹⁷黄绢月夜来找刘荃，准备写信反映情况。这种说不出的凄清况味，让黄绢和刘荃都希望可以早日逃出“魔掌”。

“土改”结束后，刘荃和张励奉命调到上海搞“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临走前，刘荃和黄绢又再一次看见一幕幕惨景，斜阳惨淡地照在黄土墙上，刘荃突然拥抱着她，紧紧地不留一点空隙。刘荃到了上海，他耳闻目睹了社会的种种“黑幕”和革命队伍内部中的许多腐败现象，越发心灰意懒。¹⁸刘荃分在抗美援朝分会工作，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生死之交的上司赵楚与崔平，可他们的妻子却是相互嫉恨、世俗又贪婪的女人，风骚的戈珊，明争暗斗的蔺盖群申凯夫等，这些都是刘荃工作上得接触的“危险”人物。有一度刘荃几乎已自暴自弃地同玩世不恭的女干部戈珊鬼混，黄绢突然的出现使他顿时感到堕落，也觉得非常惭愧。

随后“三反”迅猛展开，刘荃因上级的案子受到牵连身陷囹圄。他目睹熟人相咬及勾心斗角的事实，生死之交告密出卖，最后连刘荃也被关在狱里。这个时候，黄绢为了要拯救刘荃的性命，献出了自己的肉体，她也因此答应了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做他的情妇为条件，为了就是要换取刘荃的性命。从这里可以

¹⁷胡辛自选集：《张爱玲传》，页 312。

¹⁸胡辛自选集：《张爱玲传》，页 312。

看出张爱玲在《赤地之恋》的故事中还穿插了“爱情”的情节，让读者有另一种的新鲜感。而黄绢在此小说中也以痛苦的自我牺牲来证明她对刘荃的爱与忠贞。

出狱后的刘荃得知黄绢为他牺牲了自己的肉体这一真相，他感到非常愤怒、无奈、万念俱灰。但是，此刻的黄绢又一直不愿与刘荃见面。于是，刘荃自愿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好让可以在出生入死之中麻醉自己的痛苦。¹⁹在一次战斗中，刘荃负了重伤，五天五夜的挣扎，最后在磨难中被救了出来，后来又被美韩的军队俘虏。他的遭际让他对革命完全失去了信念，张爱玲在故事中写到，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三分之二的志愿军后来选择去了台湾，受到盛大欢迎，而刘荃是属于剩下的三分之一。他不选择去台湾并不是因为还想见到黄绢，其实是他的心早已经死了。他想不到更好的选择了，毕竟他的命是黄绢给他的。可想而知，回到大陆的战俘是不见经传的，命运也是保不住。

刘荃到朝鲜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是上海宣传“抗美援朝”的主角，同时也成为三反中被斗争批判的对象，这种被讽刺的感觉，有谁可以了解呢？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接受这样的批评。不仅如此，从《赤地之恋》故事中可以看到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段：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

¹⁹余斌著：《张爱玲传》，页 313。

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拼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²⁰

以上这段引文让笔者看到了揭露抗美援朝战争的另一面，展现战争中人的真实心态，也体现了作品的反共倾向。此外，从以上故事梗概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故事情节更为集中、统一的视点。刘荃在小说中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他的遭遇及心路历程正是张爱玲叙述的一个重点，具有“真实”的意义。原本单纯只想下乡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刘荃，但却没有想到让他受了很大的震动，还看到了社会种种腐败现象，使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感觉堕落，一切已在“幻灭”之中。刘荃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在怀疑、痛苦之中，那一番与时代及自我的挣扎不仅仅是一场精神上的炼狱，因此《赤地之恋》的主题或许可以说是“幻灭”。不过，故事到了最后，张爱玲让刘荃有新的觉悟，成了一个英雄。刘荃走过了许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事件的发生，从农村到城市再到战场，经历了种

²⁰张爱玲典藏 6: 《赤地之恋》，页 252。

种的坎坷，也目睹了种种的现实社会，但张爱玲在小说中都处理得很好，写得有层次感。

第三章 《秧歌》、《赤地之恋》的反共意识

《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张爱玲于 1954 年出版的两部“反共小说”。基本上，要了解张爱玲对共产党的描写其实并不难，首先可以先从她的《十八春》和《小艾》了解一些她对中共的写作脉络，²¹很明显地可以在小说中分别看到张爱玲所写下的中共接手中国初期、进入土改时期、土改以后农村的饥荒、三反、抗美援朝以及韩战过程。起初得知张爱玲写“反共小说”让笔者感到自己的脑海中有非常多的疑问，因为张爱玲毕竟是生活在都市的一个女子，而且在写“反共小说”之前都是写一些她较熟悉的题材，尤其是在“情爱”方面确是张爱玲的专长，但怎么可能突然之间改变了风格，写了有关农村与共产党的故事呢？

第一节 文中对“共产党”的描写

在《秧歌》和《赤地之恋》中，透过了土改时代下农村人物及共产党员的形象，再现了“共产”时代下的悲哀与荒凉，这些可说是张爱玲所要处理的人性问题。在穷形极相、浅薄拙劣的反共宣传品中，所谓的“共干”几乎都被描绘成无恶不作的坏蛋，身上堆积了阴险、冷酷、贪婪、好色等的特征。²²在这两部小说中，看到的就是这全新的共产党，因此张爱玲都借由小说中的人物对土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例如《秧歌》中，它主要透过中国土改的农村为叙事背

²¹高全芝著：《张爱玲学》，页 159。

²²余斌著：《张爱玲传》，页 308。

景，由金根、月香为农村角色，关照了当时代的土改历史过程。此外，张爱玲也透过王霖和顾冈俩为共产党员的角色，若隐若现的揭示着共产党与农村的种种问题，因此“土改”自然就是故事中重要的线索。然而，《赤地之恋》则有刘荃、张励、崔平、赵楚、李向前及李全贵为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在小说中的共产党角色，一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张爱玲之所以会在小说中对“共产党”有如此的描写其实就是要让读者知道农村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他们不仅仅失去了廉耻，就连日常生活都完全受到了控制，改变了农村人民的一切。

《秧歌》中，整篇故事可以看到作者以文笔来写对共产党的不满，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造成人民对此有强烈控诉意味。在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的期间，主人公金根的妻子原本在城里当帮佣，但从报纸媒体上得知了农村大改造，穷人都翻身了，所以也从城里回到自己的村子与家人一起生活。²³回到乡下，让月香感到非常惊讶的竟然是乡下的情况还是很糟糕，农民的生活更加穷苦，温饱的生活离他们已经很遥远了。事实上，农村的生活并没有像小说中如此“糟糕”，但张爱玲为何要以“虚构”的方式来对“土改”时期的农村进行描写以及“丑化”共产党呢？张爱玲或许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已经渐渐在腐化中，他们再也不像之前那般万事都以“人民”为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切似乎已经好遥远。张爱玲在小说中描写的共产党员不顾人民的“困苦”，反而自己却追求着“好过”的日子，这岂不是在讽刺中国共产党吗？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生活的日子已经让她无法呼吸，家族的没落，再加上中国在当时的生活总是让人恐慌不安，眼看着政治一天比一天糟糕，让张爱玲找不到一点好理

²³冯祖贻：《百年家族——张爱玲》，页 388。

由再继续呆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她开始对中国政治感到绝望不已，又无法做出任何改变，所以她只好以书写的方式来对自己内心的不满发泄出来。

《秧歌》中写了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王霖同志。他在故事中的角色相当令农民对他感到厌恶，因为他的“自私”所造，对农民的“强迫”对待，在小说中可称之为“狠”角色。张爱玲会如此对王霖这号人物进行这样的描写，笔者认为可以跟她的父亲来做一个对比。张爱玲自小就觉得她的父亲是一个“可恶”的男人，她在家简直就是一个不被父亲重视的女儿，甚至还被父亲暴力对待。张爱玲因此对“家”感到有一种“厌恶”的感觉，想尽快逃出父亲的魔掌，因为父亲的“自私”和对张爱玲“强迫”的种种因素所造，因此可以说张爱玲其实是想要发泄自己藏在内心已久的情感，所以就把父亲的角色运用在王霖这号人物身上了。话说回来，《秧歌》小说到了接近尾声，也就是新年将近，原本应该是快快乐乐地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但是在小说中的人民却都为过年而感到烦恼。每一家每一户都因为 40 斤的年糕及半只猪的问题闹得不愉快，这就是所谓的“讲钱伤感情”。王霖同志到金根的家准备要收钱，因为金根家里没有养猪，所以就得以还钱代替半只猪，但金根始终不肯交出，最后和王同志吵了起来。月香害怕事情会闹得很大，便把自己剩下的钱全都交出来给王同志，直到呈交 40 斤年糕那天，王同志故意说金根的斤两不够，使金根火冒三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动了村民一起闹哄着向政府要米粮，王同志因此下令开枪。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同志在使用强迫性的方式要农民交出钱，完全不理睬农民的生活状况，甚至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从作者的意思来看的话，她并不是故意要“丑化”共产党员的，只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政治气息，所以只好将他们描写得比真实“狠”一点，否则带不出吸引力。其实，张爱玲有

属于她自己的政治观，她认为政治可以宣传或约束，但是不能彻底改变人性。²⁴但若往好的一面想，张爱玲笔下的王同志或许是一个非常积极于推行土地政策，所以他忽略了对人民的关心，更不了解民间疾苦，以至被张爱玲安排在《秧歌》中扮演着“自私”且“暴力”的角色。其实张爱玲要求的原则性和盲目性一样强烈，她不仅仅想在原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也要求在人情方面有良好的表现，以及在虚伪和真诚之间可以达到平衡线，所以在描写王霖这一号人物的时候也尽量可以适当突出这些特别之处。

《赤地之恋》中的主人公刘荃正是积极又非常热情的知识分子，但非常扫兴的是，刘荃兴奋不已地下乡到农民的家中，却发现所谓的“土改”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这让他感到非常后悔。如果说张爱玲写的都是“真人真事”，那么照理来说她应该有亲身体验过在乡下“土改”生活，但矛盾的却是张爱玲有强调《赤地之恋》这部小说是在“授权”的情况下写出，故事大纲已经被限定好，根本就没有可以再发挥的空间，这还能说是“真人真事”吗？刘荃或许就是张爱玲找来的“受害者”，这样才能使小说更显得精彩。张爱玲使用“知识分子”来带进整篇故事中，莫非就是要让小说可以凸显出它的“真实感”，毕竟小说不完全是真实的，当中也存在这“虚构”的份量，所以张爱玲就借着“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亲眼目睹在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以便对那些“共产党员”进行讽刺。小说中的每一场斗争简直让刘荃觉得非常恐惧，他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不仅仅刘荃有这样的想法，就连跟他一起参加“土改”的黄绢都觉得这些斗争都在夺走人民的性命，可说是恐惧中的恐惧，无法再用言语来形容的“可怕”。他们俩只能看在眼里，一直对共

²⁴高全芝著：《张爱玲学》，页 190。

产的思考再进行议论。看到文中角色和安排，似乎可以看出张爱玲所写的共产党有着邪恶的形象，证明了她是以前文笔来对共产党进行发泄，也顺便让读者知道共产党员的“卑鄙”。刘荃虽然在枪毙屋主之后有自己反省，但这一切也无法改变唐家的命运，最后刘荃因为自己“背叛”了唐家而选择逃避面对唐家。另外，刘荃因为“三反”的牵连而入狱、黄绢因为要救刘荃而牺牲了自己的肉体，还当了情妇、参加志愿军后伤痕累累等的一连串情节，作者会有如此的描述或许是因为想借着刘荃来讽刺共产党。看到刘荃的所有经过，足以让笔者看到了政治制度人性的摧残和折磨。

第二节 共产党员的相处方式

张爱玲除了写“自私”和效忠的共产党员之外，她还透过那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来对共产思想进行反思反省。在《秧歌》中，身为共产党员同时也从事剧本创作的顾冈，从一味的“想象”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相处，却在面对那些抢粮被捕的农民之时，开始对共产党的思想与态度有所动摇，他已经不能忍受那些共产党员的举动，总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牺牲了人民的性命。顾冈都把共产党员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也一直告诉自己要相信他们所作的，要对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毕竟都是自己的“伙伴”。因此，顾冈内心的动摇真的因为自己私利的情况之下消失了。经过这两部小说，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秧歌》中知识分子的动摇是短暂的，然而《赤地之恋》就不一样，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刘荃受到了长期的动摇，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心也彻底死了似的。

从《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到共产党之间的相处方式并不合群、共产党员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会互相歧视及利用自己的党员等相处方式都可以在小说中看到。《赤地之恋》中的共产党员即是如此，他们都使用“利用”自己党员来对付那些富农中农，就像要对付韩廷榜那样，虽然李向前和张励都有份在这事上，但李向前却一心一意希望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张励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手段，简直让笔者觉得共产党员们都在互相残害自己的“伙伴”，这又何必呢？张爱玲从头到尾想表明的除了讽刺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就连共产党员之间的相处方式都一一描写出来，这无疑就是要让读者可以更清楚明白当时的“共产党”是如此的令张爱玲“不满意”。

张爱玲在小说中并没有写到自己“讨厌”共产党员之类的话语，但从她描述共产党员方面足以让读者可以明白张爱玲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反共”在《秧歌》及《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中存在着浓浓的气息。除此之外，对于刘荃这一号人物，很多事情的到来使他觉得自己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在他还来不及了解一切有关活动的性质，就莫名地遭到残害，这种本应该党员与党员之间就要沟通好，但在文中，张爱玲却把党员间的相处方式全都拉进一个很“糟糕”的“镜头”，无可否认张爱玲还是想再一次强调对“共产党”的不满。此外，话说回来，“三反”的宗旨原本是反共产党内部的贪污腐败事件，可是却遭到某些人的利用，当成“三反”是政治权利争夺的良好机会。于是，便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厮杀，造成社会上一直出现着斗争的局面，甚至可以只需一封毫无根据的检举信便可置人于死地，刘荃也因此被卷入于此。这一场面让刘荃完全不知要如何反抗。在“三反”运动中，一向都善于保全自己的刘荃逃不出“魔掌”，被别有用心的人陷害入狱差点被枪毙。此外，眼睁睁看着

“伙伴”们争权，甚至甘愿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刘荃已经彻底绝望了。刘荃的“绝望”也意味着张爱玲本身的心情，她对政治、社会、共产党带领的“土改”运动中可以看出她“绝望”的心情。

第三节 农民对共产党的看待

土改时期，农民非常崇拜当时的共产党员，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号人物被捧得很高的地位，就像《秧歌》在一开始，谭大娘说道：“咳，现在好咯！穷人反身咯！现在跟从前两样咯！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啊？”²⁵同样地在《赤地之恋》中可以看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口号，很明显看出其实农民非常支持共产党。但是到了土改后期，一切都变了，“共产党”的名誉开始受损，不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反而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牺牲人民，这些情节都可以在《秧歌》及《赤地之恋》中看到。其实，张爱玲的在两部小说中对整篇故事情节都拿捏得很好，在故事的前段，她并没有立即描写针对共产党，反而从人民的角度写下对共产党的敬佩等，一直到知识分子的插入才渐渐开始看到张爱玲写对共产党的批判与讽刺，事实上张爱玲就是要借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好让共产党员在小说中的形象可以显得突出。

以《秧歌》这部小说为例，顾冈与王霖同志在故事的前大半段都很受人民的尊敬，尤其是金根和谭大娘一家，他们对住进谭大娘家的顾冈都非常热情，对顾冈的照顾算是对自己家人一样的对待，虽然生活过得非常困苦，他们的言行举止都让顾冈觉得很温馨，甚至让顾冈突然觉得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但是

²⁵张爱玲典藏 5: 《秧歌》，页 19。

故事到了后半段，尤其是到了十一章开始，新年将近的那一刻一切开始变了，王霖这“可恶”的共产党员形象已到了“险恶”的地步，话说因为金根是劳模，所以王霖要他带头去挨家访问，说服人民要把钱交出，但是金根不肯，因此场面近于粗暴起来。从这里看出了，王霖的强迫性让金根对他开始产生“憎恶感”，因而对共产党产生了极度反感。这就是张爱玲在小说中所要反映的“反共”意识之一，人民最后也开始对“共产党”执行下的“土改”感到不满，也或许是因为早已有不满之处，但却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直到最后才发泄出来。如果跟张爱玲本身的经历做对比的话，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达的内心世界，然后顺道借着两部小说把内心存在着满满的不满发泄出来。

第四章 《秧歌》与《赤地之恋》的比较

张爱玲在“跋”中已经清楚地写到“《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但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²⁶与《秧歌》不同的是，张爱玲在《赤地之恋》序中陈述小说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从这两部小说的不同之处看来，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两部小说的真正的差异只不过在于“人物”这一方面，而张爱玲一直都在强调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第一节 “饥饿”形成“背叛”

《秧歌》这一部小说主要是围绕在农村的生活，整篇故事中都在讲述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但主要还是在于共产党员对农民的压迫和残忍对待，直到最后还让人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故事中的主人公金根是村里的劳模，但是他们一家人所过的生活还是一样挨饿受苦，农民们因为“饥饿”所逼，开始抢粮，结果金根受伤，后来投河自杀。女儿阿招在混乱中活生生被人群踏死，无望的月香最终选择放火烧了粮仓，原本打算与共产党同归于尽，但最后却投入了火海中。而《赤地之恋》的故事则是围绕在乡下及城市，主人公刘荃参与了从乡下的土改运动再到上海的“三反”及“抗美援朝”运动，后来又到了朝鲜战场，与其他战俘一起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刘荃经历了许多残酷的事实，就连自己的性命都差点被送走，让刘荃痛恨当初自己的选择，更对这社

²⁶张爱玲典藏 5: 《秧歌》，页 203。

会及共产党的作为感到万分绝望，但一切已经太迟了。《赤地之恋》的这部小说比《秧歌》来得更有政治性，就连故事中所描写的爱情都充满了政治暗示。

“爱情”原本就是张爱玲所擅长的题材，在文中穿插出显然让整篇小说更有新鲜感，但真心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政治的局限”而被逼分开，这根本就是小说中达到了悲惨的境界。事实上，张爱玲在创作这两部小说的时候，她的文笔看似冷静，对于“土改”那黑暗的一面她都毫无掩饰地展露出来，但可以相信她的内心深处是痛的。

《秧歌》小说中，胡适在小说的序中已经确立了全文贯穿着“饥饿”两个字眼。最为可怜的非顾冈莫属，他一心一意只想到农村体验土改后的生活，好让他自己可以写出一个剧本，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被骗了。土改后的生活竟然是这种穷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地步。

“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代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馑。……饥饿的滋味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有一种沉闷的空虚，不断的咬啮着他，钝刀钝锯磨着他。那种痛苦是介于牙痛与伤心之间，使他眼睛里望出去，一切都成为梦境一样的虚幻……”²⁷

虽然《赤地之恋》的整篇故事并没有像《秧歌》那样，连填饱肚子的能力都没有，但至少还是可以让他们看到“食物”的存在性。《秧歌》中所谓的“饥饿”不仅仅是因为在粮食上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在精神上的担惊受怕与

²⁷张爱玲典藏：《秧歌》，页 93。

恐慌，但这是另一种的“饥饿”。这种现象的产生，会比粮食上的“饥饿”来得恐怖，因为这将造成淹没人类的理智而产生了背叛。顾冈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又要面对“饿肚子”的烦恼，还要常常来一个“突击”，整夜都不能睡，这样的一个牺牲，简直逼得他快疯了。此外，在《秧歌》故事的接近尾声，月香因为对所有的事情感到绝望，导致她暗地里闯进了粮仓，放火烧了粮仓里全部属于农民的精神支柱，最后还被民兵推进火炕里去。从《秧歌》的正面来探讨，张爱玲在整篇小说都以“饥饿”来描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事实上她就是要强调“土改”后的农村，也就是在共产党带领之下，乡下的生活变得更为“穷苦”，人民因为“饥饿”而搞出了“背叛”，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达出对“共产党”进行讽刺的一面，也是她所谓“反共”气息之一。

第二节 “土改”时期的农村问题

而《赤地之恋》中，除了较完整地描写土改的过程，还写到三反运动和抗美援朝，一直写到土改之后农村的饥荒问题，从希望到失望、绝望。²⁸整篇故事除了斗争还是斗争，一直离不开那血淋淋的画面，尤其是在“三反”运动中，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一律都得受到侵袭。干部和革命斗争，贫农跟富农之间的小斗争等的现象，这些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毫无益处的事件，不但不能帮助人民解决土地分配“公平”的问题，更为人民带来伤害。张爱玲之所以要在小说中将多篇小故事穿插在一起无疑就是要表达她在中国大陆的生活逐渐“不安稳”以及社会巨大的变革，这“威胁”感对她而言是多么的强烈，就像在小说

²⁸周芬伶著：《孔雀蓝调张爱玲评传》，麦田出版，2005年，页97-98。

中，张爱玲所描写的剧情足以可以让笔者感觉到她对国家对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恐惧”。

《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小说中，张爱玲同样都描写了对于土地改革后的种种症状，就连在政府掌控中的局限都被共产党控制了。文中的共产党员不止有超越性的严控思想，而且还攻击了人民的性命，害他们失去了存活的基本权利。“害人性命”、“抢人民东西”、“饥馑”都是在两部小说中直接点明而使用的字眼。简单来说，这些土改运动改变了人民的命运，而在运动中一起扛过枪的战友却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话说回来，张爱玲会写这两部小说其实是以关心人民的幸福着想为由，因此才决定以书写的方式来向共产党提出严正抗议，她认为共产党对待人民的残忍方式，一会儿又打又杀的场面简直就是罪大恶极。张爱玲一生对政治的各种态度，虽然还未有过什么很大的意见，但对于共产党的体制则是她最终的政治态度。

从《秧歌》和《赤地之恋》的故事中，让笔者看到的是参加乡下土改后的知识分子顾冈和刘荃的真实心态。《秧歌》中的顾冈参加了乡下土改后才真正觉悟到原来乡下的生活程度并没有所谓的“提高”，反而让顾冈觉得自己活在一个阴险及无法呼吸的地方。虽然顾冈无法接受自己所在之处，但他还是不断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共产党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一讲到职工的待遇方面，马上变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者，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²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在顾冈眼中已经成了无法接受的事实，但是顾冈总是为自己及他人找借口，好让自己比较好过一点。而《赤地之恋》中的刘荃，经历了各种战争后，

²⁹张爱玲典藏：《秧歌》，页 96。

他那一颗爱国爱党的心早已经死了。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及对待，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最后他不选择去台湾当战俘其实不是因为要见黄绢，而是因为自己想当年内心充满了革命激情的一颗心已经完全消失了，对于人间的阴险邪恶已经无法从他脑海中消失。从这里来看，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达的“失望”与“绝望”，她对自己的国土、社会政治以及共产党产生了“质疑”，更希望自己可以早日远离它们。

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当中，简直把农村“土改”成了杀人的武器，原本以为土改后，农村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但往往没有想到让农民看到的却是社会阴暗的一面，农村生活已变成了一场悲剧。小说中多数的“人民”因此成了受害者，原本一个宁静且善良的乡村因为一场土改而变得鸡犬不宁，造成全乡的人民都提心吊胆，人心惶惶。张爱玲会如此写下这两部反共小说无疑就是要对共产党进行讽刺的作用。而张爱玲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创作，或许都是自己经历过社会主义解放下的中国生活，让她一直都活在一个不安宁的世界里，因此找到了机会就开始创作，顺便把压抑在内心已久的全都吐出来，毕竟在这之前，张爱玲在小说中是绝少出现对政治的不满及对共产党的批判，因此《秧歌》和《赤地之恋》可说是张爱玲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完成它的。

最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中写的都是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在文中，她以农民的理想与梦想破灭的悲剧，来控诉自己对共产党无理迫害农民的不满，其实是在为农民打抱不平，更因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故事中也可以看到张爱玲有稍微带过“爱情”的故事，但戏

份并不多，或许只是让故事显得更精彩更有趣。就连夏志清都这么认为，他甚至也给予《秧歌》评价，说它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容的。³⁰

³⁰林幸谦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10。

第五章 结语

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之书写获得许多学者的高评价，尤其是胡适先生给予《秧歌》的好评是“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可想而知胡适先生非常欣赏张爱玲的《秧歌》这部小说，认为她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已经不简单了。毕竟张爱玲在写反共小说之前擅长的是新旧时代的都市男女情感书写，完全不干涉政治大叙事，之后会移情到政治方面的创作可以说是她在文学史上的成功之一。

如果说张爱玲擅长于描写人物表现的一面，那么《秧歌》和《赤地之恋》中，笔者觉得没有很清楚地看到张爱玲这擅长的一面。或许是因为已被限制了，所以造成了故事中有很多“虚构”的出现，在人物处理方面以及一些尴尬场面的处理在文中并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例如在《赤地之恋》中，张爱玲使用太多的背景，一会儿农村，一会儿城市，一会儿朝鲜，所以这就显得有点儿乱。基本上《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写政治的暴露、社会的“恐惧”、共产党员之间的对待方式等，但也可以说张爱玲是借着书写来发泄自己内心渐渐对“共产党”的不满。事实上，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模糊不清，出场人物很多，因此让读者感到模糊，无法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阅读了《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似乎可以看到文中所用的字眼都非常平凡，并不难理解它。看到张爱玲写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当然从文中还是可以看出张爱玲其实对政治的失败是感到痛心的，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还是把真实情形写出了，对共产党下了批判。跟张爱玲前期的作品相比

之下，简直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在早期的张爱玲对共产党还满怀希望，万万想不到在《秧歌》及《赤地之恋》则推翻了她的论观。因此，从这两部小说可以看出张爱玲很明显的反共意识。

参考书目

(一) 专书

1. 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江迅〈柯灵追忆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
2. 费勇 著：《张爱玲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3. 冯祖贻：《百年家族——张爱玲》，立绪出版社，1999年。
4. 高全芝 著：《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
5. 胡辛自选集：《张爱玲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6. 林幸谦 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7. 杨泽：《阅读张爱玲》，台北：麦田出版，1999年。
8. 余斌 著：《张爱玲传》，台北：晨星出版，1997年。
9. 于青 著：《奇才玉女——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年。
10. 张爱玲典藏 5：《秧歌》，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11. 张爱玲典藏 6：《赤地之恋》，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12. 周芬伶著：《孔雀蓝调 张爱玲评传》，麦田出版，2005年。

（二）期刊论文

1. 尔纳：《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山东：山东社会科学院（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十六卷，第一期。
2. 袁良骏：《张爱玲的艺术败笔：〈秧歌〉和〈赤地之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文学会），2008年，第87期。
3. 张艳艳：《也谈〈秧歌〉和〈赤地之恋〉》，广东：汕头大学文学院，2008年，第86期。